



周一良学述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DANGDAI

RENWEN SHEHUI

KEXUE MINGJIA XUESHU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1
8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主编 林在勇

周一良著 陈怡 潘雯瑾整理

周一良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一良学述/周一良著;陈怡,潘雯瑾整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9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林在勇主编)

ISBN 7-213-01681-4

I.周… II.①周… ②陈… ③潘… III.①周一良-生平事迹 ②周一良-学术思想 IV.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7520号

周一良学述

周一良著 陈怡 潘雯瑾整理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张晖(特约)
封面设计 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 鞠朗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杭州环城北路41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2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81-4/K·507
定 价 1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001.5.18
北京图书大厦

No. 0489384



周一良先生



周一良先生部分著作

目 录

MULU

周
一
良
学
述

上篇：有涯之生	1
严师良父	3
辗转学堂间	8
哈佛的日子	16
一别“魏晋”二十春	24
劫后余生	41
下篇：无涯之史	49
心属魏晋	53
魏晋史学史	54
魏晋制度	60
魏晋人民	68
魏晋人物	74
魏晋都城	78
谈佛论史	82
来华密宗三大师	83
迟到的梵文研究	86
汉语中的梵文	92
佛典亦文学	99
佛家的史观	103

《车子理论》的真相	105
情系敦煌	112
书仪源流	114
识文断字	117
地球村里的敦煌	120
文化交流所见	124
文化需交流	124
中日两次交流高潮	130
文化因缘	149
并非“全盘唐化”	158
明治本末	162
国外日本史学	169
亚洲诸国	172
译事两难	174
结语	178
附录	
年表	187
著述要目	191

上篇：有涯之生

严师良父

21世纪近在咫尺,抚今追昔,一良感慨颇多。我虽一生平凡,但因生逢巨大时代变迁,随波逐流,不意成为大时代的小见证人。作为始终心系史学的时代见证者,垂老之年一良提笔写下此文,不仅为尽力一诉平生治学行状,对自己所学所考做一番总结检讨,同时也希望我这些深烙时代印痕的个人经历有可能成为将来中国社会史的有用史料,为明日之史学再尽绵薄之力。以下分经历、魏晋南北朝史、敦煌学、佛教史、中外关系史等诸方面分别叙述之。

我于1913年1月19日(旧历壬子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山东青岛,祖籍安徽建德,据说是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周繇之后裔。曾祖父周馥(1837~1921)字玉山,出身寒微,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详见《安徽文史资料》总第15辑载陈钧成撰《周馥轶事》),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清史稿》中有传。辛亥革命后,曾祖与其他遗老群集于青岛,我也在此地出生。但由于当时过于年幼,我对曾祖的印象不深,只记得他是个瘦高的白发老人。祖父周学海(1856~1906),字澄之,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进士。但他对仕途毫无兴趣,把精力都用于研究医学以及撰著、校刻医书上,刻

古医书 12 种，所据多宋元旧槧、藏家秘笈，校勘精审，世称善本。

我的父亲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后以字行，是实业家、藏书家，去世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父亲律己甚严，思想开明。他虽然是“北周”系统（在旧中国的实业界向来有“南张〔睿〕北周〔学熙〕”的说法，周学熙是父亲的叔父，是周家当时实业界的领军人物）的重要代表人物，业余却钟情文墨，酷爱藏书，又喜欢搜集文物字画等等。他的这种嗜好与修养无形中对我们十个子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我们十个子女后来无一涉足实业，而都从事文史、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我是父亲的长子，名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亲取自《说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说：“唯初太极，道立于一。”由于我母亲萧琬在我出生后即患急病逝世，父亲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家人。他不仅在性格上对我有很大影响，还亲自安排我的启蒙学习。可以说，我少年阶段的学习进程安排自始至终贯穿着父亲的意见。

由于父亲当时对新式学校还不太信任，我 8 岁在天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家就迁居天津）人家塾读书，直到十年后，1930 年才赴北平求学。因此我从未在小学、中学里学习过，这在“五四”以后的当时也是比较少见的。我这十年私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老师都由父亲亲自择定聘请。

头三年是三位来自扬州的职业塾师，其中有一位老先生还曾教过我的父亲、叔父、姑母等。我启蒙所读的是《孝

经》，接着是《论语》、《孟子》、《诗经》，而并非是当时私塾中常用的《千字文》、《龙文鞭影》等，这是父亲按照汉代以《孝经》、《论语》开蒙的旧制安排的。

第二阶段四年，是跟一位年轻的老师学习。这位老师姓张名恣字潞雪，是杀害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敫的次子，来教我们时只 24 岁。我跟张老师读了两部大经《礼记》和《左传》，以及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等，绝大部分所读皆能成诵。张老师循循善诱，不仅要求学生背诵，而且注意给学生讲解，亲自把《皇清经解》所收一些《左传》的注解用蝇头小字摘要抄在我的读本上。此外他也给我讲《史记》、《韩非子》等，教我作桐城派古文。张先生教书认真负责，却绝无旧日私塾中严师的架子，我们弟兄从未受过任何形式的体罚。相反先生有时还带我们出去游玩。先生讲书时，我总是全神贯注，非常爱听。不幸的是，我 14 岁时张先生暴病逝世，我们非常悲痛。回顾十年私塾教育，跟张先生这四年获益最多，长进最快，为以后我学习中国古典文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先生逝世后，我又断断续续跟了几个老师学了《尚书》和《易经》，可惜印象都不深。此外父亲还特地聘请了唐兰（立庵）先生来家塾给我讲《说文解字》，使我在学问上特别是小学方面开了眼界。唐先生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子，他在家馆任教之余，还给天津《商报》办过学术性副刊。稿件全部由他一人包办，用不同笔名发表，内容涉及经学、小学、诸子、金石、校勘以及诗词等等。我深深钦服于唐先生的才华横溢和博洽多识。正因为先生的引导，我在家塾的

最后几年也开始读一些朴学书籍，尤其喜欢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王国维的著作，曾在《观堂集林》上题下了“一良爱读之书”六个字，以示景仰。

除了学习所谓“旧学”外，家塾里还有一门功课——习字。我的习字课与一般不同，不是从写楷书入手，而是按照字体的发展顺序：先练小篆《泰山二十九字》、《峯山碑》、《汉碑篆额》，然后隶书《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最后练楷书，写过欧阳询、颜真卿、智永《千字文》等。这种习字方法也是父亲特别设计的方案，他还请他的好友劳笃文先生（劳乃宣之子）不时评阅我临写的隶书，加以指点。可惜的是，我在书法方面太缺乏天资，辜负了这种打破常规的习字程序，功夫尽管下了不少，却没有学好任何一种字体。只在年逾七旬以后，才敢“倚老卖老”，偶尔应人之邀写个书签。

除了古代典籍外，我从14岁起就在家里开始了外文的学习。这也因为我父亲的卓识。当时他认为，日本与苏俄是我国紧邻，关系必将日益密切，这两国的语言很重要。所以他计划让我学日文，我的二弟珏良学俄文。珏良后入南开中学，外语为英文。当时情况下，俄文出版物不易见到，家塾补习也不易进展。他不久放弃俄文，多年后当了英文教授。我的日文则坚持下来。起初请的家庭教师是日本外国语学校中文科毕业的公司职员山内恭雄先生，他没有什么语言教学的经验和方法，让我死记硬背地读日本寻常小学的国语课本，以后接着读中学课本。从长远讲，这种笨方法却也收到良好效果。而父亲认为读外文也要通古典，特意

又请了一位京都帝大国文科毕业的牧野田彦松先生教我一些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如《保元物语》、《源平盛衰记》，当然只是初窥日本古典文学门径，远谈不到系统学习。以后，父亲还请了英国中学的英语老师教了我英文。

父亲不仅事无巨细地关心我的学习，也非常重视教育的方法。他的话不多，但三言两语往往使我受益终生。我十六七岁时，天津的时髦女子开始流行烫头发。两个来自上海的堂姐置办了火剪自己烫着玩，也给我烫了一脑袋卷毛儿。当时父亲在唐山工作，大约每月回津一次。他不知怎么得知此事，在给我的信中并未提及烫发，却插进了八个字：“人能笃实，自有辉光。”这两句话使我深受教育，至今不忘。以后我一生朴素无华，谨遵父亲“谦虚谨慎”的教诲，并无富家子女常见的种种恶习，这当然是父亲严教的结果。对我来说，父亲不仅是良父，也是我学业、人格上的设计师，有此严师、良父，是一良平生之幸。

辗转学堂间

由于家里的开明气氛，我虽然终日坐在家里读书，但也接触到了一些“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作品，并广泛涉猎了北平几所大学出版的“国学”刊物，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国学论丛》、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之类，对北平的文史学界有所了解，因而有志于到北平的大学去读书。

这时我父亲大约认为我的旧学根基打得已经差不多了，而且念私塾确实没有出路，遂同意我去北平上学的要求。但求学北平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一无数理化知识，二无高中文凭，因此不能投考正规大学本科。而夙所向往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已经停办，只有燕京大学设有训练中学国文教员的两年制国文专修科，不需任何文凭与资历，只考中文和史地。于是在1930年夏报考了燕大的国文专修科，以第一名被录取。这时我18岁。

到北平熟悉了大学情况以后，我意识到国文专修科非旧日所谓的“正途出身”，不是长远之计。所以不想等到毕业，即急于另谋出路，设法进入大学本科。当时北平流行制造假文凭，我便在琉璃厂请刻字铺伪造一张私立宏毅中学

高中毕业的假证书。一般情况下，北平的大学是不会费事去核实的，但是比较知名的五大学（北大、清华、师大、燕京、辅仁）情况有所不同。其中只有辅仁大学当时刚成立不久，制度很不严密，文凭蒙混过关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在1931年夏天我在辅仁报上了名，放弃国文而改入历史系，没想到这一改，就确定了我一生的研究领域。

缴验中学文凭一关通过之后，就是更为艰难的入学考试。虽然辅仁比其他四所大学都省事，自然科学课程只考数学，但对我这个从未学过数理化的人来说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得已我又采用了当时北平流行的找人代考的方法，让表兄孙师白替我进了数学考场，结果一举得中，如愿进了正规的辅仁大学。

时辅仁大学创办不久，对于一年级课程不够重视，著名学者如陈垣（援庵）先生、余嘉锡（季豫）先生都不担任低年级课程。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亮尘）先生是系主任，为一年级学生开先秦史，用非所长。柯昌泗（燕舛）先生是柯绍忞长子，金石学家，却担任中国近百年史。他在堂上主要讲一些晚清掌故和典章制度，虽也娓娓动听，却与近百年史主流无关。英文与西洋史由外国神父讲授，西洋史的神父以带有南欧口音的英语，照本宣科地读海司与穆恩的教本。回忆起来，只有英千里（戏剧家英若诚之父）先生所授逻辑学一课最能吸引我，无论内容、口才、教法与风度，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因此辅仁历史系并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与功名心，又想再次“跳槽”。只是国立大学插班转学必须先考一年级入

学考试各门课程，我当然无望，而燕京大学转学只考中文、英文，于是我决定卷土重来，再回燕京，于1932年顺利插入历史系二年级。在燕京我还结识了我未来的妻子邓懿。1933年春假，我和同学到泰山、曲阜旅行。在玉皇岭夜宿遇盗，我的冬大衣与钱包被抢走，次日清晨只得裹着棉被下山，向来自天津的国文系一年级女生邓懿借钱，回津后开始来往。1937年春间订婚，顾随先生曾赠联，“臣日期期扶汉祚，将称艾艾渡阴平”，嵌入周昌邓艾两姓故事。1938年春在津结婚。燕京同学在校刊上报道，戏称我们为“泰山情侣”。十年之后，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我们合写一文评论赵夫人杨步伟口述、赵元任先生笔录的《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使用了笔名“岱侣”。

在燕京，我主要从学的教授是邓之诚（文如，1889~1960）先生和洪业（煨莲，1893~1980）先生。此外也常去听历史系顾颉刚、钱穆、张星烺、李德、贝特，国文系顾随、郑振铎、马太玄，英文系包贵思、柯宓喜，哲学系张东荪、黄子通，社会学系雷洁琼，法律系李祖荫，经济系崔敬伯等诸先生的课。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邓之诚先生。邓先生是把我带入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的引路人。

我插班入燕京后，首先补听了一年级必修的邓先生的中国通史，他讲这门课颇见精彩，引人入胜。邓先生性情狷介，对同辈人多所臧否，如在课堂上经常说“城里头有个胡适”云云。有人甚至戏言说他印行汪梅村的日记，是因为日记里不止一处骂了安徽绩溪人。但他对青年人则是古道热肠，多方扶持鼓励，从未听说哪位同学遭过训斥。当时学生

常去老师家，邓先生之门也是我们经常出入的。先生的教诲很多，我记忆最深的，是先生常说：“研究学问每年都要有所长进。”这句话和陈垣先生要求自己“每年要写一两篇有分量的文章”，都成为我以后念念不忘而始终未能完全达到的标准，也推动我在学业上不断有所前进。

邓先生早年对南北朝史下过功夫，编纂过有关这时期风俗习惯的书，据传曾受其尊人影响。我正是听了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的课程后，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由此粗识三国两晋“八书”、“二史”之门径，为以后数十年从事之专业奠定基础，而开蒙指引，实赖先生。学完邓先生的课后，我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这是我头一次写历史论文，也是头一次从事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从此一发便不可收拾，以后几十年一直搞这一段历史，我应当永远感谢引进门的师傅邓先生。而另外一位恩师洪先生则在方法学上让我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使我一生受用不尽。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燕大历史系的两根台柱邓先生和洪先生可谓“貌离神合”。洪先生经常西服革履，一手执手杖，一手端烟斗，完全西方绅士派头。邓先生则是灰布长袍，头戴红顶瓜皮小帽，不仅永远穿布鞋，而且永远扎起裤腿。但正是这两个生活习惯迥异的先生不仅交情很深，而且和衷共济，各自发挥所长，把历史系办得很有生气，使系办刊物《史学年报》继续了十年之久，在史学界很有影响。洪邓两先生的关系，是蔡元培先生办北大的“兼容并包”精神在燕京的具体体现，也是抗战前北平一些较好的大学的共同优点。